

深圳農村經濟系列叢書
SHEN ZHEN NONG CUN JING JI XI LIE CONG SHU

深圳河告訴

——來自深圳特區

何建華 著

27.65

5)



特约编辑: 温定凯

封面设计: 谢 鸿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之二)

深圳河告诉世界

——来自深圳特区边境农村的报告

何建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照排 上海市场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32 字数75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8-01133-8/F·211

总定价 29.50元 (五册)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序

李 广 镇

深圳农村经济，在十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条金色的道路。我市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的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报告文学家撰写的这套《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反映了深圳农村的深刻变化，宣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讴歌了深圳农民改革创新、艰苦创业的精神，丛书忠实地记录深圳农村十年光辉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农村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是传统落后的产业结构，向三大产业整体协调发展的新型结构转变。农业、工业的产值比重发生根本变化，外向型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原来以粮、油为主的农业单一生产结构，已被以禽畜、蔬菜、水产、水果四大鲜活商品基地为主的优化结构所代替。农村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但农业并不萎缩，农产品稳步增长。二是封闭的自给性农业向创汇型的商品农业转变。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形成以“特区、香港”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贸工农生产体系，商品率、出口率不断增加。三是单家独户“小而全”的经营，向着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大农业方向转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几个层次一齐上”的发展方针，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新的组合，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改革，是深圳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除了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制度外，全面取消了统派购制度，农副产品全面放开价格。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农村整个市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面向市场，运用价值规律，引导资金投向建立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华宝牧工商联合公司、宝安县养鸡公司、光明华侨畜牧场等十个单位和经贸系统有出口权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各自形成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带动经济发展。

——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推行股份合作制。在农村推行集资股份企业的同时，把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折股分解到村民作为股权，消除长期以来集体财产权属不明，分配无制度等弊端，从而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干部廉政建设。

——改进“外引”工作，兴办外向型乡镇企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在深圳农村经济建设中，涌现出大批有技术、善管理的经济强人，他们是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时代弄潮儿。通过学习、实践，他们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水平，创造了许多业绩，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中大显身手，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选择一批在我市农村经济建设中卓有建树、值得纪念而富有特色的单位和个人入书，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单位和个人在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成绩。她将给广大读者带来鼓舞和启示。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参加写作的作家们，为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裂变

- 1. 铁丝网的这边与那边..... 1
- 2. 逃港大风潮..... 6
- 3. 历史应当重新书写..... 9

第二章 活循环

- 4. “洗脚上田”..... 13
- 5. 迷人的“四步舞曲”..... 19
- 6. 富的构架..... 25

第三章 投资潮

- 7. 面对祖业..... 29
- 8. 变死钱为活钱..... 35
- 9. 农民股东..... 48
- 10. 繁荣的谜底..... 50

第四章 城市梦

- 11. 壮哉，农民城..... 54
- 12. 奔向工业文明..... 60
- 13. 舞好“三条龙”..... 69
- 14. 深圳的魅力..... 75
- 15. 裂变的观念..... 80

第五章 拓荒牛

16. 人间正道·····	88
17. 汗洒创业路·····	96
18. 芒草的风格·····	102

第六章 五彩路上

19. 飞鸟归林·····	110
20. 代际超越·····	115
21. 政策这个法宝·····	120
22. 跨世纪行为·····	126
尾声 中国的世界童话·····	130

第一章 裂 变

1 铁丝网的这边与那边

“这边与那边，原来是一家子，都是祖宗的田，祖宗的山，祖宗的水，来去是很自由的，日子也过得差不多。后来，慢慢地，两边有了距离，这边的人想往那边了，来去也不那么方便了，只是由于那边的日子过得好，而这边呢，越折腾越穷，越穷越失去人心失去吸引力。”我在皇岗、岗厦、福田、罗湖、罗芳等边境村采访时，这些村的村长都不约而同地带我到制高点，带我到边境线，指着那如巨蟒般静卧在山野田地之中的蜿蜒的黑色铁丝网，语调沉重地回首往事。

铁丝网煞是壮观。尤其是到了夜晚，网顶端的白炽灯一齐放亮，形成一条沿着二十多公里长的深圳河闪烁着亮光的“火龙”。被人们称为咸淡水交界线的深圳河，它的上游，靠近沙头角镇的高山背后，由于泥沙的淤积，已经成了荒落的草地了，当中只有一道涓涓的细流。它的下游，河道较为宽阔，淡黄色的带有咸味的河水，缓缓而流，流过几道河湾，便是宽广的海湾了。正是这条二、三十米宽的深圳河，加上那条沿河耸立的铁丝网，隔开两个世界，五星红旗和米字旗分别在河岸两边升起。

宝安县地处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又有很长海岸线，海产丰富。可解放前是处女地，比起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东莞、顺德、番禺、中山各县，差距很大，可算是个穷县、三等县。宝安给人难忘的，也正是有个深圳边界。解放前，广九铁路是从广

州直通九龙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站，但乘客都意识到，过了深圳就是“出境”了。解放后，因为和香港谈判广九直通火车未达成协议，广九车只开到深圳，深圳便成为沟通香港的唯一通道，地位才显得重要。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深圳镇驰名远近。镇内设有许多外驻机构，如铁路系统的深圳火车站，各省驻深圳的外贸机构，九龙海关等。这样，自然就有不少人到过深圳镇，知道深圳镇。除此之外，深圳镇同其它地区的小县城相比，没有特别之处。深圳镇规模很小，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在1972年为19700人，到1977年为24887人，其中还包括农业人口。全镇只有1间中学、3间小学。整个镇只有纵横两条街道，长度均不足1公里，东西走向的一条叫做解放路，两边排列着一些商店；南北走向的一条叫做人民路，主要是宝安县的一些机关。环绕着深圳镇周围的，是拥有18个生产大队、8660人口（1978年统计）的附城公社。附近农民到镇上买卖货物，采用的是赶集（当地人称为“墟”）的形式。镇上设有一个农贸市场，平时几乎不见人影，逢墟的日子人们才集中上市交易。

这就是历史赋予深圳的色彩。无疑，这一片土地，同共和国怀抱中的无做村镇一样，保持着一种自然经济的原始色彩。

然而，正因为深圳地处边境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它驰名远近的同时，这一片土地以及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共和国经受政治动荡折磨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片刻的安宁。

“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湾这一带，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是难得的鱼米之乡，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富庶之地。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反而会越搞越穷？这要从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找原因。”

宝安县人大副主任林剑峰，曾长期在农村基层当公社干部，

对那一段历史感受极深。他说：

“那时，在思想政治上，狠抓一批一斗；在生产上，实行以粮为纲；在产品上，统得过多过死；在工业品上，买卖销售困难；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等等。这种极左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敢搞家庭副业，不敢搞水产养殖，更谈不上发展工业了。和平大队原有10000亩水田，60年代以前以养鱼虾为主；70年代初期，30—40%改种水稻；70年代后期，把全部水田都改成稻田。一个劳动力负责10亩稻田，每天夜以继日地干活，非常辛苦。1亩稻田顶多只能收100元左右，而1亩水产品比种稻米的收入要高出二、三倍，一个劳动力可负担50至100亩，产品可以出口香港，市场广阔。这样清楚的一笔账，但就是不让你去算，非得种粮食不可，不然就扣你一顶资本主义的大帽子，逼得你非这样做不可。

“农民搞点家庭副业，也受种种限制。养鸡养鸭都有数目规定，一个小队，一个家庭或一个农民只准养几只鸡或几只鸭，多了不行，就批你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你的‘尾巴’。鱼不行，虾不行，鸡不行，鸭不行，菜不行，果不行。这不行那不行的结果，把个很好的鱼米之乡，越搞越穷。你说人们能够安心顺心吗？”

“你猜我今年多大岁数？50出头了？没有。我今年才43岁。看上去挺苍老，是吗？你想想，当了20多年基层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得承受多大压力，能不老吗？”

“以前边境一带大搞‘政治边防’，我们村成了前沿阵地中的前沿。搞阶级斗争的那些年头里，我们这里是重点，工作队要么不来，一来就是省里的。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我们罗芳村人，专门拣路边田头的香烟海绵头，把那个时候内地少见的海绵头当作批资本主义的活材料。文革中，说这里的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统统靠边站。

“我17岁不到就入党，18岁时就当副大队长，管1000多人。2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运动一来，我就靠边；运动一过，又让我上来。在那些极‘左’派的眼中，我是很右的。其实，当时一点也不讲唯物辩证法，不讲究实际。你想想看，我们罗芳村有60多亩田在铁丝网那边，每个劳力几乎都有过境耕作证，天天到那边去种田，看的是那边的，吃的是那边的，用的也是那边的，你能用内地人的眼光要求吗？当时我就想不通，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想让人民富，不准让人民富？而这样搞的结果，使我们罗芳村‘耕田靠人帮，花钱靠香港’，个别人甚至大着胆子，从过境耕作的口子里夹带走私。那种极左的做法，真是一种小人主义，咱们国家就给这些人搞坏了。”

有着一张典型广东人脸庞，思路敏捷，言谈之中带有理性色彩的罗芳村党支部书记陈天乐，回忆起那段历史，显得尤为动感情。

手头有一份比较客观分析当时附城公社农村经济的资料，它是这样记载的：

附城公社位于深圳镇周围，有18个生产大队，1978年共有2003户，人口8660人，农业劳动力3497人。除渔民村以捕鱼和养鱼为主要经济收入外，其余17个大队均从事农业生产，全公社1978年初共有耕地13986亩，平均每人拥有土地1.62亩，每个劳力拥有4亩多上地。

从解放时起一直到办特区之前，附城公社的经济一直是封闭式的小农经济。1978年以前，宝安县每年下达给附城公社的农业生产任务一般是水稻播种面积2万多亩（早晚两季合计）、花生3000亩，每年征购任务是粮食4.3万多担，花生3800多担。此外，还有甘蔗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征购任务，以及生猪、鸡、鸭、鹅的饲养量和征购任务。为完成任务，附城公社集中了90%的劳动力搞农业生产，还安排部分人搞集体养猪，剩下从事工副业生产的劳力不足10%。所谓工副业主要有修理、碾米等项

日，收入微薄。附城公社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型的，生产队年产的粮食、生猪、花生等，先交售征购任务，然后分给社员自用：甘蔗在大队办的小糖厂榨成糖后，上交部分给县糖烟酒公司，其余分配给社员。蔬菜由各户在自留地上自种自食。

附城公社有8个大队处在与香港分界的铁丝网边缘地带，全社共有1300多亩土地在铁丝网外香港境内。对这些土地，各生产队可安排人员过境去耕作。过境耕作的人员，必须家庭成份好，个人表现不错，经大队推荐上报县公安局，取得由县公安局发给的“过境耕作证”。1978年前持有这种证的人只有200多人，他们到香港耕种，产品在香港销售，每月上交一定资金给生产队，在生产队记工分，参加分配。持有过境耕作证的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收入较多，生活高于其他农民。

至此，资料笔锋一转，作出如下分析：

同1978年以前全国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准相比较，当时附城公社并不差。以1978年为例，附城全社共播种水稻18500余亩，平均亩产387斤，总产71900多担；种植花生2036亩，平均亩产167斤，总产3300多担；种蔬菜1570多亩，总产4万余担；外加甘蔗、木茨等其它作物和生猪、塘鱼等收入，当年三级总收入为259万元，其中公社一级收入10万元，大队和生产队二级共收入249万元。扣除成本，提取集体积累后，社员平均每户收入826元，每人184元（其中最低的梧桐山大队平均每人年收入为75元）；每个劳动力全年收入439元，每月36元。用现在的标准看确实不高，但是在当时，象附城公社这样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也算难得了。

但是，附城有它的特殊性。附城公社与香港相连，交通方便，而香港的农产品自给率很低，价格大大高于内地市场。如果允许农民利用这一条件发展商品生产，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快富裕起来，而不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但在当时，农民恰好在生产什么、销售给谁、以什么价格销售等方面，都没有自主权。

生活改善的速度就一直很缓慢。

材料是翔实的，数字是确凿的，分析是中肯的。只是在附城的特殊性作了阐述之后，用了一个乌托邦似的美好假设，因为那个“如果”，在那个特定的岁月里，根本不可能被确立。

一次，面对一张巨大的深圳市地图，一位老同志对我谈起当时大搞“政治边防”的地域概念。那时，西到珠江口，东到大鹏湾，南起深圳河，北至宝安与惠阳交接的那一条曲线，都实行岗哨制度，可谓壁垒森严。有些特殊地带，如横跨铁丝网的边境村和沙头角镇等，则是边防禁区中的禁区，不是一般的普通边境证可通行的，必须标明所去地点，由专门机关盖章方能生效通行。在这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中，一切都必须以阶级斗争这根弦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敌情观念是第一位的，哪里还谈得上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起来？

就在我们这边封锁国，沿着拉满铁丝网的边境线筑一道铜墙铁壁，关起门来打“内战”，一心只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种经济奇迹却在只有一网之隔的那边——香港发生了。被世人称为弹丸之地的香港，50年代初大多仍是荒山野滩，到了六、七十年代，成片的高楼大厦象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一跃而为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齐名的国际大都市。

一道铁丝网的这边与那边，再也不是一个平衡的世界了，这中间有一道贫穷与富裕的深深的沟壑，呈现在世界的面前，嵌入了人们的心间。正是这条难以抹去的沟壑，深深埋下了一种危机，一种发源于人类本性的大危机。

2 逃港大风潮

香港！香港！！香港！！！！

铁丝网那边的那个世界，象一块充满魔力的巨大的磁铁，在

南粤大地激起旋风般的人心紊乱，导演出一场震撼广东震撼香港的人间悲喜剧。

时间：1979年。

那年春节刚过，一股潜流突然演化成汹涌奔腾的大潮，从铁丝网边的边境农村开始迅速向内地扩散，一下子席卷整个广东省。人们象着了魔似的涌向边境，涌向铁丝网，涌向杂草丛生的海滩，涌向惊涛骇浪的大海，唯一祈求的，是涌向那传说中比天堂还要美好的香港，去做工，去赚钱，去过好日子。

一位当时的目击者回忆说：那时的这一带可真是热闹哪！每一个边防哨卡口，几乎都堵满了人。也不知哪来这么多人，有骑自行车的，有开汽车的，有步行的；有成群结队的，有单身一人的，有扶老携幼的，有拖儿带女的，甚至于还有些残废人拄着拐杖来的。一路上看过去，人流不息，浩浩荡荡。这些人，大多数被堵在边防哨卡，经劝说解释，返回家乡。也有不少人，躲过边防战士的眼睛，白天藏在群山中或海滩上的杂草里，到了晚上，或爬越铁丝网出境，或乘小船顺大海的潮流朝香港那边漂。好多人逃到了香港，也有一些人，从山上掉到峭壁下的深沟里或遇到风浪掉到海里被活活淹死。那时候的情景，只要闭上眼睛一想，就全都历历在目，真是触目惊心哪！

“那年头的逃港风就象一股12级台风，一下子把各级领导的工作头绪给搅乱了。那时根本谈不上抓生产，主要精力都放在抓外逃上。从1979年到1980年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县里市里的领导到公社大队的一般干部都是抓反外逃。不抓不行，这是原则立场问题。但抓又抓不了，因为法不治众，抓多了又容易与群众情绪对立起来。”

林剑峰当时在福永公社当党委书记，亲身经历过那场反外逃的斗争。也许是时过境迁，如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他说：“那时候，不分白天晚上，我们组织队伍在珠江口西海堤巡逻放哨，那儿是用船漂过香港的理想地方，人很多，花再大气力也挡不住外逃的势力。偷渡者开始是白天躲在海边，到了晚上架着小船走，后来不怕了，白天都开着小船走。西海堤这一带淹死不少人，原因是算不准潮涨潮落，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遇上风浪。福永公社有一个塘尾大队，一条船淹死3个人。那只小船只能坐10个人，那天却挤上去20多人，严重超载，晚上到海上，突然遇到风浪，翻了，不懂水性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当时市里县里公社各级都成立反外逃指挥部和办公室，主要领导和公安局长、副局长都下去抓，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精力都扑上去了，但还是没用。尔跟群众说，外逃是犯法的，那边是资本主义，还是我们这边好，群众就是不听。一些人甚至说，我们深圳与香港原来就是一家子，解放初两边还自由来往，不少香港人还回到这边来找工作 and 读书。我们有很多亲人在那边，为什么不让我们去香港？我们到那边去，是投亲靠友，怎么能说我们是‘逃’呢？”

资料显示：

深圳市有关部门组织专业堵截队伍，共450人，这些人从农村招收，能享受户口、劳保、招工等优待，故颇有战斗力。1979年11月24日开始执勤，至12月26日，共截获外逃人员2787人，占同期全市截获（不含港英遣返）的89%。其中，本市802人，外县市及外省1985人。

几天来出动1万多人次进行搜山，清查，验证，堵口。深圳地区分6片，分片包干，领导带头。

广州军区、省军区组成14人的联合指挥部，由副司令和副政委带队，调集18个连的部队参加反外逃堵截。

花费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精力，仍然阻止不了外逃的潮流，为什么？其中最实质性的症结是经济问题。

一位被遣返人员在交待逃港动机时说：年终结算人均2.08元，有的不到1.50元，寒心！

另一位青年说：“深圳机关、厂矿企业有工资收入的职工都外逃，何况我？当农民辛苦，收入低，生活有困难，哪有不走之理？”

从本质上说，经济利益、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人们在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的过程中，首先想获得的就是经济上的解放。中国南方边境线上的那段往事，正好说明了这浅显的道理。

从1957年始，大批人员经深圳逃往香港，一共发生过3次风潮。外逃人员中很多是外地的，但在深圳镇和附城公社的总人口中逃到香港去的人员所占的比例，则不是其它地区能比的。他们中很多有亲属在香港，对边境线的情况特别熟悉，外逃极为容易。附城公社从1957年至1978年，跑过香港去的达1万多人，比目前罗湖区农村总人口还要多。

吸引如此之众的人，上演如此宏伟的逃港大剧的原因，就是那亘古不变的经济驱动力。七十年代末，香港一般工人每月收入已达1500港元左右，大大高于内地。当时香港缺劳动力，当局对逃入的人抓得不太严，多数逃过去的人都能较快找到工作，取得身份证。这样，香港无疑便逐渐成为具有强大向心力的磁场中心，成为七十年代末南粤大地上那幕大剧的舞台背景。

3 历史应当重新书写

经济落后造成外逃风潮，使农村强壮劳动力大量流失，对深圳镇和附城公社以及这一带农村落后的经济产生更大的冲击，陷入一种落后——外逃——更落后的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附城公社黄贝岭大队，历年外逃去香港的累计达2000人左右，是目前该队总人口的两倍多。该大队办特区前有2018亩土地，因

大部分劳动力外逃，无法耕种“两造”，只好轮流耕种，早造耕种的，晚造丢荒；晚造耕种的，早造又休闲。该大队第一生产队，1957年以前劳动力100多名，其中男劳动力40余名，1962年大部分外逃，只剩下4个男劳动力，一年里单是馱牛耕田都应付不了。莲塘大队的西岭下生产队，土改时有20多户人家，后来只剩下1户没有逃走，目前该队的其他户都是外地迁入的。而罗芳村解放以来逃去香港的共有453人，等于该村目前人口的2.7倍。这个村的农民不愿耕种，宁愿利用“过境耕作证”去香港给新界的农民种菜，每天拿港元工钱。为了不使罗芳村的土地丢荒，宝安县委和附城公社党委，每逢农忙季节都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去罗芳义务劳动，罗芳村因此被人们戏称为机关干部的“小农场”。

而更为严重的流失，是一种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人心的流失。成千上万的炎黄子孙，把由子祖宗的昏庸无能而拱手相让给英国殖民者的那块弹丸之地当成心目中的天堂，无情地打破了几十年来我们不惜一切地吟唱着的田园诗般的牧歌。

南园村党支部委员麦有样家，在1979年的外逃风潮中一下子就走了4个同胞：3个弟弟和1个妹妹。那时，整个村子都象着了魔，香港怎样怎样好捞的传说象蝗虫般漫天飞舞，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不得一分安宁，都在议论着、筹划着去香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也许对内地来说，以前的那种宣传教育还能生效，因为可以象井底之蛙一样坐井观天，只看到自己头上的那块天空。但对我们这一带的人来说就不行了。这里邻近香港，可以说原本就是一家，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都是来去自由。后来，越封锁越严，但铁丝两封不了人心。那边富了，日子好过了，我们这里就人心不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谁愿意受苦受穷？

罗芳村的陈天乐看问题则更为深刻，他是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的：人民跟着共产党走，真心诚意。解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

也是人民的选择。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唱《社会主义好》，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是多么的幸福。可是三、四十年过去了，人们就不免发生疑问：为什么住的房子还是祖父留下来的？为什么穿的衣服还是好多年前的？为什么吃的东西还是粗茶淡饭甚至有时还要挨饿？这就是社会主义吗？就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的道路吗？再看我们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地狱”里的人们却生活富裕，又怎么能让人们信服呢？农民看问题是很现实的，他们往往从自己的生活实际中去感受和判断事物。过去那种穷社会主义，又怎么能让人们满口称好呢？不可能。越是这样做，往往越失去人心。

如诉如泣的深圳河，不能在哀怨与悲愤中默默流淌，你应该重新改写过去那屈辱的历史，写出一个新时代，一个充满着期盼、希冀、憧憬的新纪元。

1979年春夏之交，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在深圳发生：一天，在原宝安县（当时还未改成深圳市）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有新闻记者列席的工作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辩论会。辩论的中心题目是：外流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能够用专政的办法来对待外流的群众吗？今天看来，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荒唐，但在当时它却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尖锐问题。

辩论会气氛严肃，空气似乎有点凝固。经过多轮激烈的辩论，最终统一了认识：长期的极左思想影响，十年动乱的破坏，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是边境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不能靠堵、靠抓、靠专政工具。只有发展经济，加强边境地区的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才是治本的办法。——这一是非问题的澄清，成了深圳历史发展的转折。这个背景，也是在深圳办特区的一个直接来由。

一声春雷在中国南粤上空炸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重